



中国农村研究 · 政治系列

话语政治

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运作

纪程◎著

Huaya Zhengzh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村研究·政治系列

话语政治

纪程◎著

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符号权力运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话语政治 / 纪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5004 - 9916 - 9

I. ①话… II. ①纪… III. ①农村 - 社会变迁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9478 号

责任编辑 冯春风 刘 倩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90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 陆学艺 张厚安

主 编 徐 勇

执行主编 邓大才

编 委 (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金红	王敬尧	邓大才	石 挺
刘筱红	刘金海	李德芳	杨海蛟
吴理财	何包钢	陆学艺	陆汉文
项继权	贺东航	高秉雄	唐 鸣
徐 勇	徐增阳	曹 阳	谢庆奎
董江爱	景跃进	詹成付	戴慕珍

出版说明

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迁，也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学术对象之一。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人员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从事农村基层政权研究，1990 年前后由四川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20 世纪 90 年代，我们的研究重心主要为村民自治和村级治理，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到 21 世纪初，我们的研究领域由村治扩展到乡村治理，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乡村治理书系”。现在，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其理由：一是自 2000 年本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来，其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不仅以乡村治理为研究重点，而且涉及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农村文化、农村教育、农村历史等。原有的书系名称已无法涵盖现有的研究内容。二是学术研究贵在持之以恒，更在于是一项以探求学理为唯一使命的事业。中国的学术由于一直伴随着问题而经常非学理化。“三农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中国农村研究”作为本中心一个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将致力于中国农村的实证调查和学理研究，以此标志我们进一步的学术自觉。

编 委 会
2005 年 5 月

总 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大国。

中国是一个世界农民最多的大国。

中国是一个正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剧转变的发展中大国。

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的世纪性难题。20 世纪以来，中国在解决这一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惨痛的教训。进入 21 世纪，农村和农民问题还将存在，并会呈现出新的特点。一个古老农业文明大国迈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过程如何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事，也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广阔的空间。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研究丛书”。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心人员就致力于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1990 年前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系列丛书”，1992 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了《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1995 年由武汉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等专著。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村治书系”（一套 10 本）。21 世纪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乡村治理书系”。2005 年，我们决定以“中国农村研究书系”作为本中心长期使用的学术品牌。

我们撰写、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目标有四个：一是观察、记录、研究中国农村的变革历史；二是研究中国农村变革发展中的问题；三是挖掘和培育中国农村实证研究学者，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四是建设中国农村研究学者交流对话的平台，特别是为学者们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建

构既能够解释中国农村，又能够解释世界农村的分析框架提供交流和对话的平台。

鉴于这个目标，“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以经验研究为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实证研究见长，过去以定性经验研究为主，近几年随着“百村观察”和“中国农村数据库”的建设，计量实证研究也开始起步。“中国农村研究丛书”的经验性成果既包括田野调查成果，也包括在历史的“田野”中调查的成果；既包括定性经验研究，也包括定量经验研究；既包括案例研究，也包括计量研究。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以跨学科研究为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综合性的农村研究基地，以研究农村政治问题为主，同时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我们期望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解剖中国农村、研究中国农村，形成对中国农村的整体认识。因此，“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也烙上了跨学科的烙印，不仅出版的成果具有多学科的特点，而且大多数成果打破了学科壁垒，跨越了学科界限，运用了多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是中心成果的展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走过 20 年的历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实际、实证、实验，即“三实”研究风格。中心的研究正处于一个从方法论的自觉阶段转向自为阶段、从理论建构的洞察力阶段转向概念化阶段、从粗放式研究阶段转向精致化研究的阶段。“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将集中展示中心及其学者的转型研究和最新研究成果。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中国农村研究丛书”是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具有发展性和持续性。“中国农村研究丛书”将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的学者的著作为主，同时吸纳优秀的中国农村实证研究成果。我们希望，“中国农村研究丛书”能够变成中国农村研究学者、各个学科的学者对话的平台。丛书将在中心“三实”宗旨的指导下，长期撰写、编辑、出版中国农村研究的优秀实证研究成果。

“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与“中国农村调查丛书”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两类主要的系列丛书。“中国农村调查丛书”包括四个

子系列：一是中国农村调查·名村系列；二是中国农村调查·名人系列；三是中国农村调查·调查报告系列；四是中国农村调查·咨询报告系列。“中国农村研究丛书”与“中国农村调查丛书”是中心的两类姊妹丛书，前者以学理为主，后者以应用为主；前者以个案研究和计量研究为主，后者以调查报告和研究报告为主；前者立足实践，但超越实践，后者立足实践，也服务实践。

作为学者，作为教育部综合性的农村研究中心，我们有自己的学术理想和理论抱负，希望通过“中国农村研究丛书”的撰写、出版，促进中国农村实证研究的发展，促进中国农村实证研究学者的成长，同时在研究发展中形成具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农村实证研究。

徐勇

2010年5月12日于华师桂子山

序

本书是一部运用话语分析工具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著作，读来饶有兴味。

话语是人们说或写出来的语言。语言是人们交往的工具。话语包括谁说（写），说（写）什么，怎样说（写）。话语作为人们交往的工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人们会运用话语影响他者，形成特有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也被称之为话语权。因此，福柯等人将话语也视为一种权力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非常善于运用话语影响他人，对话语也看得很重。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皇帝“一言九鼎”、士人“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但在传统社会，话语是分为不同社会层次的。皇帝官僚社会使用的是“官话”，乡土社会使用的是“土话”。“官话”虽然背后有强大的帝国权力作为支撑，一言不合，可能惹来杀身之祸，但其影响力毕竟有限。这与帝国对乡土社会的渗透能力的限度有关系。近代以来，中国开始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国家对社会的改造和渗透能力极度强化。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将现代政党和国家话语传递到分散的乡土社会，由此改变传统的乡土意识。本书首先论述了由中国共产党建构的“阶级话语”是如何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的。包括“诉苦”、“翻身”、“刨穷根”、“斗地主”、“分果实”、“划成分”等。通过诸如此类的“阶级话语”进行社会动员，将农民动员到其作为其利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伴随国家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出现了一系列相关的国家话语，如“集体化”、“社会主义教育”、“农业学大寨”等。总体来看，自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是政党和国家话语全面渗透和覆盖乡土社会、进行政治动员和整合的时期，表现出政党和国家的强势。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上外在于政治的农民开始成为

“政治人”。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的大规模改造、动员与整合，与其成功地运用话语工具密切相关。特别是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没有简单照搬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而是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建构起农民一听就懂，一懂就动的话语，如“诉苦”、“翻身”、“刨穷根”、“斗地主”、“分果实”等。而在社会主义集体化过程中，这种能够将“官方”思想化为乡土语言的话语则比较少，更多的是一般性口号。由此也蕴涵着公社体制后来被废除的命运。改革开放以后，乡村的话语则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既有国家话语，也开始出现“市场话语”，乡村传统话语也再度复活。这正反映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变迁。本书从话语的角度来梳理乡村社会的变迁，的确能够让人耳目一新。同样一件事情，研究角度不同，效果也不一样。

本书是我国较早运用话语考察乡村社会变迁的著作，也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作者在就读博士生期间，思想活跃敏锐，独立思考意识强。因此他能够率先运用当时还不为农村问题研究所重视的话语方法研究乡村社会变迁，特别是能够在一个县进行实地调查，从实地调查中发现影响乡村社会的主要话语。这使得该书不仅角度新，而且事实依据充分。当然，作者毕竟进入话语分析这一领域时间还不长，特别是对于如何将话语分析与乡土社会变迁结合起来分析还不甚成熟，使其博士论文也有所欠缺。如在人民公社体制，活跃于乡土社会的并不完全是“官话”，诸如“瞒产私分”、“包产到户”等与“官话”相对应的民间话语也呈现暗流涌动之势。这反映即使在公社时期，国家也没有完全覆盖乡村社会。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自己的不足有很清醒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博士论文答辩后，他没有急着出书，而是经过了数年的再调查和修改，才将本书贡献给读者。这反映了作者的认真负责态度，而这正是一个学者能够不断前行的重要品质。

做学问除了有“灵气”所产生的“爆发力”以外，还要有“底气”及能够持续钻研的“持久力”。本书作者是一个有灵气的人，我相信他能够以此书出版为新的起点，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

徐 勇

2010 年岁末

目 录

序	徐勇 (1)
导论	(1)
一 研究的缘起	(1)
二 中国乡村政治与社会的研究综述	(7)
三 基本概念说明	(12)
四 研究方法、思路和资料说明	(18)
第一章 个案县的背景	(21)
一 自然环境及经济概况	(21)
二 历史沿革	(23)
三 “传统时期”乡村状况及乡村话语	(25)
第二章 “阶级话语”对乡村社会的嵌入	(32)
一 “诉苦”——被规训的农民私愤倾诉	(35)
二 “翻身”——“阶级话语”嵌入乡村社会的标志	(40)
(一) “刨穷根”——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阶级教育	(40)
(二) “斗地主(富农)”——“阶级话语”的实践	(44)
(三) “分果实”——用物质手段整合农民	(47)
(四) “划成分”——村社成员身份的重新定位	(53)
三 “动参、支前”——运用“阶级话语”动员农民 参与战争	(56)
本章小结	(63)

第三章 “国家话语”的灌输、渗透与嬗变	(67)
一 “合作化话语”	(68)
二 表述性“阶级话语”	(77)
(一) “社会主义教育”——用表述性“阶级话语”进行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	(78)
(二) “四清”——借表述性“阶级话语”整治基层干部 ..	(81)
三 “革命话语”的泛滥	(87)
(一) “革命话语”的暴力	(88)
(二) 政治夜校——“革命话语”在乡村社会的规范 传播途径	(94)
(三) 农业学大寨——“革命话语”引领下的乡村政治 运动	(96)
本章小结	(103)
 第四章 “革命话语”在乡村社会的消解	(106)
一 “革命话语”的惯性	(106)
二 “革命话语”的消解	(110)
(一) “四类分子”摘帽——“革命话语”消解的前兆	(111)
(二) 人民公社解体——“革命话语”消解的开始	(112)
本章小结	(116)
 第五章 “多元话语”解读“乡村混合型现代化改造”	(119)
一 “经济话语”——主位的乡村话语	(120)
(一) 1980—1985 年, 乡村“经济话语”关键词: “以粮为主、多种经营”、“科学种田”	(121)
(二) 1985—1990 年, 乡村“经济话语”关键词: “乡镇企业”	(124)
(三) 1991—2001 年, 乡村“经济话语”关键词: “三提五统”、“摊派、集资”	(127)

(四) 2002—2005 年, 乡村“经济话语”关键词: “招商引资”、“打工”	(134)
二 乡村干部腐败——人性、风气、体制合力打造的怪胎	(141)
(一) 人性	(145)
(二) 风气	(146)
(三) 体制	(147)
三 从“糊弄人”到“能人拉票”——村民自治在乡村 社会的嬗变	(149)
(一) “村民委员会选举全是‘糊弄人’”	(152)
(二) “村民委员会选举就是村里的能人拉票”	(154)
四 计划生育——国家意志、基层政府利益与农民传统 生育文化的博弈	(158)
(一) 1980 年代: “宁让家破, 不让国亡”	(162)
(二) 1990 年代至 2005 年: “计划生育是 乡镇政府的摇钱树”	(164)
五 “上访”、“拦访”——“弱者的武器”与新权力 运作技术的博弈	(169)
(一) 农民上访——“弱者的武器”	(169)
(二) “拦访、截访”——新的权力运作技术	(173)
六 乡村治安状况“恶化”——体制转型的伴生现象	(176)
七 “关系话语”——“圈子社会”的标志性话语	(182)
本章小结	(186)
 第六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的乡村话语	(190)
一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 管理民主”	(191)
二 “粮食直补”	(196)
三 “家电下乡”	(201)
四 “新农合”	(212)
(一) 农村“合作医疗”的兴起、衰落、重生	(213)

(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的农民“新农合”	
话语	(220)
五 “新农村文化大院”	(230)
六 “新农村社区建设”	(236)
本章小结	(252)
结语	(256)
一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研究框架的兴起及在中国	
研究中的应用	(256)
二 “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研究概述	(261)
三 结论	(263)
参考文献	(270)
附录：临沭县常用方言词语	(280)
后记	(283)

导 论

一 研究的缘起

2003年我很幸运地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博士学位。经过一年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知识积累后，我注意到近些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故而乡村研究也逐步成为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显学”。国内学术界的这种氛围深深影响了我，我逐渐对中国的乡村政治变迁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鉴于国内学术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已很难实现学术创新。于是我的导师徐勇教授一方面安排我阅读政治学及乡村研究方面的经典作品，另一方面指导我从“话语”视角切入中国乡村政治变迁研究，以期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

话语研究最初属于语言学领域。在语言学里，话语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句子以上的语言单位。话语可以说是说出来的，也可以是写下来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说出来的话语要先于写下来的，所以当代语言学把说出来的话语视为第一位的，写下来的是第二位的。话语是由两个互相依存的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话语内容，也就是言语者表达的思想内容；另一个部分是话语形式，也就是言语者借以表达思想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语言，这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语言，是话语的个别形态，是话语的存在形式。所以个别的、具体的话语形式是研究语言的原料或素材。人们常说“语言表现思想”、“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的真实性表现在语言之中”等，这在话语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以说，话语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

在世界范围内，语言学家对口头话语的研究可以说直到录音机的发明才真正开始（注意口头话语研究跟语音或声韵研究是不同的）。在此以

前,人们为了抓住口头话语,就采取文字记录的办法(文字记录所能保存的口语信息是很有限的,丢失的东西很多)。西方的话语研究起步较早,古希腊有研究文字记录下来的口语的专门的学科,称为“rhetoric”^①,译为“雄辩学”。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雄辩没有了市场,“雄辩学”也随之失去了地位。其中残留下来的是“style”,即风格,包括修辞格。文艺复兴时期研究修辞格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古典的“rhetoric”(雄辩学)在欧洲跌入低谷,在现代语言学的影响下,“stylistics”(文体风格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部分替代了“rhetoric”(雄辩学)。改革开放以后,“stylistics”(文体风格学)和“rhetoric”(雄辩学)都被介绍进来。

20世纪语言学研究形成两个大的学派,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开创者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结构主义语言学派认为,语言的表层是各种语言现象(语言的应用),它纷繁复杂、转瞬即逝,语言学的任务就不包括对这些语言表层研究,而是对语言所具有的稳定的结构系统(深层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以及在意义生产中的作用进行探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这一倾向也影响到同时期的哲学领域。以弗雷格(G. Frege, 1848—1925)为先驱,以罗素(B. Russell, 1872—1970)、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 1889—1951)为主要代表的分析哲学以及以卡尔纳普(R. Carnap, 1891—1970)为集大成者的逻辑实证主义,都把句法和语义作为哲学讨论的出发点,认为一切哲学谬误乃至知识的谬误都是由于语言的误用所致。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研究、分析语言的逻辑形式,创造出一种人人都能正确使用的人工语言。他们试图通过对语言本身的诸规则和规律作科学分析以说明意义,从而把语言从事物和意义之间的一个透明媒介的地位中解救出来,并以此来杜绝对世界描述和解释的含混不清与纷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模式存在很大的问题,这种研究模式强调意义不指向文本之外的东西,认为意义是由文本的结构产生的,而忽视了广泛的社会实践系统对意义的影响。只关心能指与所指,而不关心指

^① 陈介白:《新著修辞学》,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23页。

称的目的；只关心语言的形式和抽象的体系，而不关心语言的实际运用情景；只强调文本的自律性和语言的共时态，而不致力于对语言的动态变迁及其变迁原因做出解释。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这一研究模式实际上很难应对语言使用的现实。被尊为“文化研究之父”的英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曾指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是一场“虚幻的科学梦想”^①，他们将意义所产生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以及各种权力的关联排除在外，忽视了主体的解释特征。实际上，无限丰富复杂的意义恰好是在语言的使用中产生的，语言一经在社会生活中使用，能指与所指就不只是简单的对应关系，指称的目的性必然产生。因此，对语言的研究必须包含情景解释。于是，西方的哲学研究领域首先出现了话语转向，西方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语言游戏说”，抛弃了早先对理想的人工语言的追求的做法，主张联系语言使用者的日常实践活动来考察语言的含义。后来的赖尔（G. Ryle）、奥斯汀（J. Austin）、施特劳森（P. Strawson）和塞尔（J. Searle）等代表人物都接受了维特根斯坦关于词的意义在于词的用法，句子的意义与它的用途、目的、语境有关的观点。他们的思想构成了话语分析理论中的言语行为理论。

在西方语言学内部，弗斯（J. R. Firth, 1890—1960）和韩礼德（Michael Halliday, 1925—）师徒开创的系统功能主义语言学派首先打破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形式的过于偏好，把语义作为语言研究的重心和出发点，认为在人际交流中重点关心的应该是语言的意义，而不是语言的结构和形式，语言系统是可以进行语义选择的系统，传播的目的是一种意义上的传播。这成为后来语言学话语分析的重要理论来源。功能主义语言学派的最大特点是强调话语的社会性，话语的使用功能为话语的结构提供最终的解释。20世纪中期以来功能主义大有取代结构主义成为语言学主流之势，这就为其他学科进入到话语研究领域打开了方便之门。因而西方话语研究在20世纪逐渐从语言学领域扩展到其他许多领域之中，如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学批评等。给这些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领域。20世纪

^① [英] 斯图亚特·霍尔编著：《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